



夏
衍
近
作



夏衍近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封面设计 陈世五

摄影 胡颖

夏衍近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 插页5 字数131千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500册

书号：10118·356

定价：0.69元



夏 衍 近 照

出版说明

蒐集在本书的二十多篇文章，有作者谈戏剧、电影创作的经验；有对“左联”的回忆；还有对老一辈革命家和作家的追思。作者以其亲身经历，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面，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发展情况；总结了党在领导文艺工作中的得和失的经验教训。不但使青年文艺工作者从中得到启示，也为文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

目 录

生活 知识 技巧·····	1
杂谈思想解放·····	14
文艺上也要搞点法律·····	18
解放思想 勤学苦练·····	22
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32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 大会闭幕词·····	41
从广州会议谈起·····	51
我的期望·····	60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70
在电影导演会议上的讲话·····	78
历史的回顾·····	98
“左联”成立前后·····	106
“左联”杂忆·····	135

“五四”杂忆	146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151
巨星永放光芒	156
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	163
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	170
知公此去无遗恨	178
悼念田汉同志	184
秋瑾不朽	194
杨度同志二三事	199
从《忠臣藏》想起黄遵宪	203
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	208
忆谷柳	212
悼念应云卫同志	217

生活 知识 技巧

——在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象一声春雷，在文艺界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气象。首先冲向敌阵的是文艺界的轻骑兵——漫画和曲艺。就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的几天之内，成千上万张专业和业余画家的漫画贴遍全国城乡，威慑敌胆；相声、曲艺通过广播、电视，强烈地讽刺和揭露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的丑恶和凶残；接着，话剧一马当先，成为揭批“四人帮”的主力先锋。一九七七年我们看到了《枫叶红了的时候》、《曙光》、《转折》，今年，我们又看到了《最后一幕》、《报童》、《丹心谱》、《东进，东进！》；文学界也不落后，我们高兴地在报刊上看到了年逾八旬的茅盾、叶圣陶的

文章，古稀之年的巴金、沙汀也焕发了青春。姚雪垠不仅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他的长篇小说《李自成》，而且做好了这部长篇完成以后的创作计划。诗人徐迟，别出蹊径，写出了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大批新人的涌现，其中一位中学教师刘心武，写出了短篇小说《班主任》，有些外国评论家把《哥德巴赫猜想》和《班主任》认为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文艺界最有特色的作品，其特色，在于作家解放了思想，写出了过去很少触及的新的题材。在这些方面，可以说一年初见成效的目的已经达到。作为文艺战线的重武器的电影，由于“四人帮”破坏严重，生产周期较长，现在放映的新影片中，为广大观众欢迎的不多，有几部影片还受到了观众尖锐的批评，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四人帮”肆虐时期写成的文学本，后来经过修补而拍成的，多少还留着帮气的痕迹，但是，电影艺术的前景，还是乐观的，李准的《大河奔流》、梁信的《从奴隶到将军》、苏叔阳的《丹心谱》即将拍成电影，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基础较好的电影文学剧本，出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业余作者，如《沧桑大地》的张暖忻、姚蜀平、李陀，《梅岭星火》的黄会林、绍武，《罪人》的王芝瑜、苏立群等等。

这一时期文艺方面的成就中，最值得高兴的，一是新人辈出，其次是思想解放，体裁多样，敢于冲破过去的“禁区”，注意到塑造人物性格，开始清除了过去那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的风气。当然，这一切都还是第一

步，还只是初见成效，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不少障碍，还有不少困难。最主要的是“四人帮”的流毒很深，影响很大，还没有彻底清除，不能说我们的作家已经完全心无余悸。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华主席的指示：“我国人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把揭批‘四人帮’的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从理论、路线、政策、作风等方面，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思想上、题材上、创作方法上还有不少长期以来束缚我们手脚的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框框杠杠。这种清规戒律和框框杠杠是由来已久、“四人帮”肆虐以前已经存在的，对此，我们这些管过文艺工作的人，也负有责任。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其他原因，在扩展创作人员的生活广度和深度，组织创作、培养新人、加强和改善领导……这些方面，我们都缺乏经验，犯过错误，今后应该切实改进。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政策，正象对工业、农业、教育、科技一样，应该有一些具体的，切合实际的规章条例。在第三次文代会后，中央宣传部曾拟过一个“文艺八条”。但这个条文还没有实施，就被林彪、“四人帮”一棍子打死，将它说成是文艺黑线专政的纲领，因此，在抓纲治文艺的新的时期，我们还希望有一个贯彻毛主席文艺方针政策的具体条文。

以上是我对当前文艺界现状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下面就我近来看到的为数不多的话剧、电影剧本以及其他文艺作

品，讲一些我认为为了繁荣文艺创作，提高作品质量等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作家的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已经是常识，但这方面确实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谈到生活，首先要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即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是我们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新的长征的关键时刻，而我们的作家队伍，确实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生活。在题材问题上，党中央、文化部希望我们能有更多更好的反映现代生活的作品，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要求反映现代题材的作品能占主导地位，因此，作家的生活问题，就显得更突出了。就我看到的一些作品来说，我们大多数作家亲身体会过的生活，或者说有感性的生活，是否可以说也有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中间，我指的是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就性质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对这个时期的生活，我们比较熟悉，比较有体验，比较有感情。两头小的一头，我指的是古代、近代，特别是从清末民初到二十年代；另一头，指的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对于古代、近代以至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前后的生活，我们当然不可能去亲身体验了，那么，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生活，我们的情况是如何呢？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所有专业作家、业余作家，都失去了体验

生活和创作的自由，白白地虚度了十年，当然，我们也体验了一些受“四人帮”迫害的生活。可是，我们现在正处身于一个沸腾的时代，也就是工业、农业、科学、人民生活大革命、大飞跃的时期。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恰好是世界上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空前发展的时期。过去是美国超过了英国，这十多年是西德、日本正在赶超美国。工农业生产、组织管理，以至人民生活都发生了使人不能想象的变化。可是我们——包括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对于阶级斗争也许还有一定的生活，但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方面，我们的知识和生活，除少数人之外，几乎可以说知道的不多，或者很少，也就是说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生活体验。以我个人为例，我是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学工科的，在解放初期，我还以为自己在工业方面有一点基本知识，可是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我到国外走了几趟，发现即使就我的专业来说，也几乎成了完全的外行。最近我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日本的几个纺织中心正在大批地拆毁、砸烂在我们这里还在广泛使用的纺织机器，因为他们已经发明了电子计算机控制的新型织布机，就是说中国旧式的织布机，英国贾考特式的织布机已经快被淘汰了。又如在六十年代初，在炼钢方面，氧气顶吹技术我们并不落后，可是不久美国改用了氧气底吹转炉，接着日本再进一步，用了氧气底吹加废气冷却的技术，使炉龄大大延长，生产迅速增加。这些不过是技术创新使工业生产发生巨变的几

个例子，更不必说微观世界的开拓，信息科学的发展，以及与此有关的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等方面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了。工业方面如此，农业技术也在起巨大的变化，外国已经跨过了机械化、电气化时代，把重点集中到良种培育、新型肥料、无污染农药等方面，由于这些方面的变革，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一年可以生产粮食十一万两千斤，四十年代，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农产品，能供养十一个人，到七十年代中，一个农业劳动力就能供养六十个人了。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方面，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方兴未艾，在过去，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用世纪来表达的，如十八世纪比十七世纪，二十世纪比十九世纪等等，到了二十世纪，这种发展的速度，就用年代来表达了，如某一种技术、机器是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水平等等，可是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每年有发展，每月有发展，甚至每日有发展，真的可以用“日新月异”这句话来表达了。对于这些，我们不仅没有生活体验，甚至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事。现在党中央号召我们三大革命一齐抓，要在本世纪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号召文艺工作者在文艺作品中，现代题材要占主导地位，希望我们写出反映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思想、精神面貌的变化，也就是写出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今后的二十二年中，手脑并用的劳动英雄，他们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雄心壮志，他们的广阔的视野，他们的激情、思维、想象力、语

汇、表达方式，不但会不同于五四时代的英雄人物，而且也会不同于五十、六十年代的英雄人物。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两方面如果没有生活，没有感性知识，是不可能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新的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英雄人物，也不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的。现在是我们刻不容缓地投身到工业、农业、科技等方面的火热斗争中去的时候了。在开全国科学大会时，科学院邀请了不少文艺工作者去列席，他们已经主动地找上门来了。现在，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树雄心、立壮志，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去体验生活的时候了。

我们要让现代题材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当然并不排斥写历史题材，特别是民主主义革命的题材，这方面的生活，我们不可能去亲身体验了，要理解和熟悉这方面的生活，要写这一方面的题材的作品，只能靠间接的体验和知识，只能通过读书、学习，掌握大量资料，但现在看来，我们的作家队伍中，除了郭老、茅盾、叶圣陶等为数不多的前辈外，历史题材方面的知识，包括象我这样的五四时代的所谓新文艺工作者，似乎也还是相当贫乏的。举一个例，五十年代我曾建议电影厂写一部以李时珍为题材的电影剧本，可是问遍电影厂的编剧，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这个任务。好容易找到一位老新闻记者张慧剑，才写了和拍成了这部影片。在六十年代初，我又建议写一部以宋代大科学家沈括为题材的影片，许多人连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可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七卷巨著中，对于沈括是十分重视的。沈括不仅是大科学家，还是文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是世界上第一个断定中国有石油的人，石油这个名称就是他首先提出的。我建议写这些人物，并不是厚古薄今，而只是为了古为今用，唤起我们民族的自豪感，不让洋人和我们的后辈说我们数典忘祖、割断历史。且不说古代，就讲现代吧，我最近看了一些话剧和电影剧本，也感到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青年作家对清末民初、五四前后，甚至抗战前后的题材，也知道得不多，很不熟悉了。我前面提过的几个较好的电影剧本《沧桑大地》、《梅岭星火》，他们写李四光、他的几个学生，写陈毅、他的几个战友都写得相当出色，可是写蒋介石、国民党官员、外国记者，就相当差劲了。由于他们都还年轻，对当时的时代背景、风俗习惯、语言等等不太熟悉，没有很好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们在作品中描写这些人物时，也不免有公式化、简单化，乃至漫画化的倾向。把反面人物模式化、漫画化，把外国人一律写成反动派，那是不真实的，即使是反面人物，也各有他们独自的性格、身份、语言，以及符合于这些的行动、表情。用简单化、概念化、漫画化的方法，是不能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尽管全剧写得好，也会留下若干败笔的。再举一个例，不久之前，一位朋友介绍给我看了一部青年业余作家写的小说，题材是抗战末期华北地区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那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情况：写正面人物比较好，写反面人物

和美国人就很概念化。其实，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也应该一分为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来对待，特别要注意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抗战末期美国派到中国来的人，也应该做具体分析，因为在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派到中国来的军人、文职官员、新闻记者也不一律是反动派，其中有不少同情中国的人，至少有同情中国抗战的人，还有少数是美国共产党员，当然其中有反动派和特务。这和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以后的情况有区别。五月二十日报上登了叶剑英、聂荣臻、邓颖超、康克清同志会见抗战时期美国派驻延安的观察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的报道，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说明了即使在美国政府派遣到延安来的人中，也有不少同情中国、甚至同情中国共产党的人在内。一分为二、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事物，对我们写近代和历史题材是十分重要的。写小说、剧本，问题还不大，假如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一律写成是帝国主义者、反动派、特务，把与这些外国人接触过的中国人，都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而写入档案，那问题就严重了。不用说，到中国来的外国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也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性格，也应该用阶级分析，也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每一个人，甚至连太平天国时期，英国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侵略军中，也还有过因为同情中国人民而投奔到太平军中去英国人。我们要区别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帝国主义者、反动派中，也不是铁板一块、

千人一面，他们之中有军人、商人、冒险家、牧师等等。在反动人物中如此，他们的正面人物也有不同的性格，例如白求恩和柯棣华同样是战争时期到解放区来援助中国的医生，他们的经历、性格，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对这些方面缺乏知识，是我们写作历史题材一个很大的障碍。“四人帮”惯用的手法，一是绝对化，二是简单化。绝对化，就是好的百分之百的好，坏的百分之百的坏，正面人物不能有缺点，不能有转变；简单化，就是他们所说的“划等号”，例如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叛徒一定是特务，外国人一定是帝国主义者，和外国人有来往的一定是里通外国等等。对此，我建议青年作者们，读一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一点中外历史，读一点自然科学，读一点清末民初小说、笔记，读一点五四前后的代表作品，读一点中外关系史。要文艺工作者对这些方面都精通，那是有困难的，但是，对这些方面有一定的常识，却是十分必要的。我还要强调多读书、多积累知识的重要性。五十年代初，我在作协召开的一次青年作家座谈会上，强调了一下“知识就是力量”，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个讲话成了一条罪状。“四人帮”说：“知识越多越反动”，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党中央、华主席不是号召我们学习、学习、再学习吗？多读书，多学习，多积累知识，正是我们对“四人帮”的有力回击。

其次，我还想讲一点写作方面的技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文艺作品要“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